

发现中关村

北大学子眼中的“中国硅谷”

季羡林题



◆ 姜宁 肖楠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发现中关村

——北大学子眼中的“中国硅谷”

姜 宁 肖 楠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现中关村/姜宁,肖楠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
ISBN 7-301-04888-2

I. 发… II. 姜… III. 高技术产业-经济开发区-调查报告-北京市 IV. F279.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797 号

书 名: 发现中关村——北大学子眼中的“中国硅谷”

著作责任者: 姜 宁 肖 楠 主编

责任编辑: 周月梅 瞿 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888-2/G · 631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理科编辑部 62753160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32 开本 12.25 印张 317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编委会成员

顾问委员会：王登峰 林钧敬 张彦 刘颖
沈千帆

指导单位：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总策划：沈千帆 王干

主 编：姜宁 肖楠

副主编：唐睿 孔新峰

编委会成员：章永乐 刘颖 王妍 张敏
陈虹 林俊 周晓刚

序

在知识经济勃兴之今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进步，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日益明显。而中关村作为中国最大、世界少有的智力密集区，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的实验基地。

一百多年来，无数北大学子为了他们心中的民主与科学理想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一百多年来，北大学子身上凝聚了一种心系祖国、关怀社会的深沉责任感，这种理想和责任感的闪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北大学子身上，总是指引着中国向着“好的、向上的”方向前行。作为具有百年优良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更应该竭尽全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很多人都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每当我周末漫步在中关村的时候，也会想到在这一片我读大学时曾是菜园农田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也许没有太多的人去仔细想过中国的“硅谷”究竟应成为什么个样子。在过去一些年中，对中关村的评价也褒贬不一，但中关村依然以它的魅力，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科技人员、教授、企业家进驻这块土地。北大的一批青年学子利用假期的休息时

间投身于关于中关村的调研之中，用全新的视角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诸多层面剖析了中关村的现状，探讨了很多前沿性、敏感性的学术问题，解释了很多中关村所特有但尚非人所共知的现象，并描绘了其未来的美好前景。应当说，这些青年学生所做的尝试为这种贡献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这些见解代表了他们自己的一种声音，代表了他们对中关村这块土地的沉思和热爱。

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逝去的岁月终究被尘封在历史的轨迹中，北大也在随着时代和社会而不断前进。但是在这种变迁之中，我却始终感受到了一种精神的传承，这是一种青年人特有的探索新知、独立思考的意识，一种团结协作、不畏艰险、执著追求的精神，本书的完成正是这一精神的最好写照。诚然，这些青年人的探索只有在经历过时间的检验后才能证明其价值所在，但无论如何，我为他们拥有这种精神而欣慰，亦希望他们的研究犹如火炬一般，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与方向。

许智宏

2000年11月于燕园

前 言

沈 千 帆

100 多年前，法国著名思想家蒙田提出了一个平凡而深刻的问题：“我知道什么？”100 多年来，人类在不断地反思自我、开启心智、探索新知，创造了比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的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其实质都是在不断回答和丰富这个问题。它如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一样，都是为人类创造发展动力的终极哲学思考，并在最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里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共鸣。也许每当静夜深思、独对孤灯，你我的内心中都会反复响起这样一个声音：我知道什么？

1000 多年前，唐代著名谏臣魏征在《上太宗十思疏》中开篇即写道：“臣闻欲求木之长久者，必先固其根本；欲求水流之深远者，必先浚其泉源。”回顾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始终都是在努力回答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性问题。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中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解放生产力，打破对生产力的各种束缚。伴随着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深刻认识，我们先后在社会生产领域、政治体制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我们的工作重点正在转移到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各个地区空间和时间的距离不断缩小，人类的各種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和紧密，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

们选择了加入 WTO,加入到一体化进程中去。与此同时,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繁荣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放缓了脚步。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所隐藏的重复建设、粗放型经济等问题都逐渐显露出来。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选择了拉动内需的策略,力图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开拓国内市场,加快经济增长。而这两种选择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中央制订了加快高科技产业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为我们指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

在五年前,我们曾经认识到,当今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已经日益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今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高科技产业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 21 世纪,谁掌握了经济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制订规则的权利,谁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高科技产业不仅是对我们的一次挑战,更是一次机遇,一次可以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样的历史机遇并不会有太多。如果说在八九十年代,深圳和浦东先后成为了中国与国际接轨的“实验田”的话,那么,21 世纪,发展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实验田”会在哪里?

历史把机遇留给了中关村。这里集中了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各级、各类高等院校 68 所,包括中科院研究所在内的各级、各类科研机构 213 家,37.5 万科研人员和 4000 多家高新技术企业。1999 年底这里的技工贸总收入已经达到了 864.1 亿人民币,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中关村的目前状况,似乎再恰当不过了。而更重要的是,它是靠着内生的自发的力量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惟有这样的力量才是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源泉所在。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关村还肩负着繁荣首都经济、保持南北经济力量均衡的任务,并可以为资源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探寻一条新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关村已经不再是一个地域概念,而是一面旗帜,是一面创新精神的旗帜,一面知识经济的旗帜,一面代表我们的民族在

探索新知、追求卓越的旗帜。这样的旗帜就如同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一样，在无数人的心中播下种子，在不知不觉中推动着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今日的中关村正在经历着一场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在不停地变动：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无序，一切又都显得那么富有活力。这样的变化不能不激起我们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在支配着它的转动？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它的根基在何处？这种好奇心常常拨动我们的心弦，触动心灵深处那个隐藏着的疑问：我知道什么？

正是在这种疑问的驱动之下，我们组织并开展了此次调研活动。在这里，就首先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是学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儒家的“入世”传统，“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是其一生的价值追求。如果在某一时代，学者只能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则这样的时代必然是极端封闭、落后和保守的，学术在本质上是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和假说，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正是这种解释和假说不断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做学问需耐下性子、吃得辛苦，但学问本身却并不要求“清苦”，对社会前沿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考，才能体现出学术的真实价值。

其二，是学生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做学生的过程就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知识的积累不仅来源于课堂，更来源于社会现实生活，“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高居于象牙塔之上，不去体察社会现实的真实状况，就会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青年学生提出了“要把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殷切期望。

其三，是学生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学生是一个独立的青年群体，青年人并无太多的社会经验，也就没有太多的思想包袱，因此，学生敢于独立思考、追求新知、打破传统。他们有着独特的眼光、敏

锐的视角,而这正是学术创新的原动力。“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往往可能对局内有着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组织学生系统地对中关村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克服了很多难以想见的困难,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建立了开放的系统模型,探讨了很多前沿性、敏感性的问题,并对很多人们所普遍关心的现象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思考,提出了一些新颖独特的见解。

不管结果如何,过程总是美的。在两个多月的调研历程中,我也在同他们一起思考着各种问题,我惊奇地发现很多熟悉的事物会变得陌生,很多清晰的概念反而越来越模糊。“知识经济”究竟是何种状态?创新的真正动力在什么地方?“硅谷模式”真的可取吗?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关村又会怎样?这些问题在不断困扰着我,不断鞭策着我进行“认识—否定—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使得我对“我知道什么”这一问题答案的不确定性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过程总是在使你不断开拓视野,得到新的视角和改变对事物的固有看法。如果在这一过程中真的能知道一点东西的话,我想答案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思想发展的一小步,可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一大步。

目 录

第一篇 走进中关村	(1)
I 经济特区之后,中国需要什么?	(3)
II 硅谷梦,何时才能圆?	(12)
III 中关村,你就是你自己	(24)
第二篇 发现中关村	(31)
I 中关村人力资源状况	(33)
谁创造了中关村:创新智慧型人才的聚集	(33)
II 中关村资金流通状况	(45)
1.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渠道	(45)
2. “资本”为“知本”铺路:中关村风险投资的兴起	(58)
3.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中关村融资的法律环境	(69)
III 中关村技术创新状况	(89)
1. 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与企业组织演进	(89)
2. 展望未来:中关村创新网络的研究	(107)
IV 中关村激励机制状况	(130)
1. 中关村电脑软件行业激励机制的问题	(130)
2. IT 产业 A 型行为者工作满意度分析	(166)
第三篇 中关村环境	(175)
I 政府:服务还是管理?	(177)
1. “小政府、大社会”:中关村科技园管理体制的价值及其 限度	(177)
2. 服务重于管理:中关村管理委员会公共政策执行状况	(193)
II 法律:知识背后的“坚盾”	(219)

	法律环境亟须完善：中关村知识产权现行状况调研	(219)
Ⅲ	市场	(240)
	中关村的基础：电子信息产品流通的“中关村模式”	(240)
Ⅳ	外部力量	(252)
	1. “合纵”与“连横”：作为中介组织的商业与 同业协会	(252)
	2. 轻松时刻：中关村周围的休闲场所	(268)
第四篇	中关村企业	(280)
Ⅰ	校办企业，红旗还能打多久：“北大天正” 启示录	(283)
Ⅱ	学生创业，看上去很美：高校学生创办企业发展 现状	(300)
Ⅲ	海外背景，纳斯达克的宠儿：亚信之路	(316)
第五篇	中关村之路	(340)
Ⅰ	知识经济与中关村	(343)
Ⅱ	保卫中关村——“入世”对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 的影响	(354)
Ⅲ	中关村创新文化的现状与发展	(362)



第一篇 走进中天村

I 经济特区之后,中国需要什么?

孔 新 峰 (政治学系)

回眸中国 20 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诸多学者均认为其呈现出一种浓重的渐进型特征,其中贯穿着“农村包围城市”,先易后难,先沿海后内陆的改革程序和脉络,适时确定阶段性的改革目标,合理安排改革的先后顺序,找突破口,试验推广,以点带面,双轨合流。这一改革模式适应了改革进程中的不可控因素与不确定性信息的安全稳妥处理。“双轨制”普遍适应了中国“乡村—城市”与组织和地域多重经济二元性特征,并保证转型自始至终动力充足,以可预见并可控的前瞻力避开了路径依赖的误区。

所谓“双轨制”,我们认为不可仅指诸如价格双轨制等既定的改革举措或体制创新,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对外开放领域,即如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对外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开放与开发上海浦东新区等,甚至进一步说,包括港、澳在内的所谓“政治特区”(特别行政区)及至本书将要深入探究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均可纳入“双轨”之列。然而正基于此,考察作为上述诸制度创新滥觞的经济特区也就具有了非同小可的意义。因而下文我们将首先回顾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继而把握现状,并通过经济特区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比较分析对发展科技园区上现实意义的因应之策作出自己的探索,最后对其发展远景作一展望。

一、山重水复特区路

中国 20 余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及其经济神话风光无限，亮丽至极。然而经济特区并非中国才有的独特景观，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初设经济特区之时，世界范围内已有约 400 个各种可谓经济特区原型的自由贸易区存在。若究其类型，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自由港及面向海外的金融区等，其中 1966 年台湾高雄设置的出口加工区对中国的特区政策影响最大，从起初深圳等地“出口特区”之称可见一斑。1979 年，中国政策经济学家代表马洪提倡采用“香港利用法”，即利用香港的市场、资金、技术、经营管理，与香港的资本家们合作生产，在香港附近地区设“出口加工区”。于是，一穷二白的宝安县始受命运垂青，开始发迹。而当我们再将目光投到经济特区成立的背景上时，则不难发现对外开放以引进资金（特别是华侨资本）、技术、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邓小平同志对此曾有“四个窗口”的经典概括）乃其最大背景，而其初始阶段又大量拷贝了李国鼎之台湾高雄出口加工区的特质，因而我们不妨将“欧风美雨”乃至“台风港雨”视为经济特区的催生物，乃是当时中央政府因应时局的一大英明政策创新。

然而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特区有其本身鲜明的特质（原创性），正是下述一些特征对我们今后之行文受益匪浅。首先，中国经济特区相比其他国家、地区之自由贸易区与出口加工区而言规模大出许多，如：台湾的出口加工区高雄、南梓产、台中的面积分别仅为 0.69 平方公里、0.9 平方公里和 0.23 平方公里，而深圳经济特区达 327.5 平方公里之广，特区内有蛇口工业区、福田沙头角保税区及深圳高新技术开发区等。从中可见搞活区域经济乃设特区之初衷，且这一起爆器做得够大，以及中央对其外溢效应所持有的高期望值。其次，由于中国经济特区主要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之

上,其诞生意味着在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经济试验场,中央可以将有关经济政策在此先行试验,再向国内其他地方推广。可这恰与庞大的计划经济母体针锋相对,若无当时中央政府之强控制力则无以保证其健康成长,及至围绕此问题产生了诸多争论,我们将在后面再评述这一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三,该举措带有鲜明的政治印记:它具有“统一祖国”的重任,作为形象大使,经济特区是强烈认识到与之毗邻的港、澳、台而设的,而 1984 年 2 月小平同志的“特区窗口论”更将其上升为“对外政策的窗口”地位。风物长宜,面对 20 世纪末诞生之港、澳特别行政区,深、珠两经济特区恰似政治、经济缓冲地带;而基于上文之“试验场”性质,特区政策又常常成为中国(后来包括自主性渐强之地方)政争的一块晴雨表。

下面进一步关注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经济特区的诞生可让我们以深圳为例。追溯至划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向中央要求扩大自主权;同年,国务院 38 号文件提出:在广东省宝安县开设“工农业商品生产基地、旅游区”;1979 年,广东省委将宝安县改组为深圳市(省直辖),完善了经济特区设置体制;2 月,国务院在深圳设“出口商品基地”;4 月至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经过长期酝酿正式下达了关于实施“特殊政策、弹性措施”的文件,试行深圳“出口特区”。1979 年末,广东省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草案》;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正式将其称为“经济特区”;并于 1982 年在宪法第 30 条写入了“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法律规定”的内容^①。及至 1988 年 4 月,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最终将海南岛升格为省并划为最大的一块经济特区。

由上述分析可见,经济特区政策出台的前后无不体现了一个传统上的强计划、重控制的集权型国家的转型期特点,体现了由政

^① 经济特区自然不能等同于特别行政区,但一些论者基于强调经济特区的特殊性而认为特区可包括以港、澳为代表的政治特区与以深、珠为代表的经济特区两类,如谢庆奎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政府》,编者在此亦采此说。